

SHIJI XUEREN

第三卷

ZISHU

高增德
丁东
编

世纪学人

自述



他们
构成了一幅
20世纪
中国学术史和知识分子命运史的
全景图

他们的心路历程
集中地
浓缩着
民族的精神历程

学者集体的心路
就是民族的心路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第三卷

高增德 丁东 编

立
纪
学
人
自
述

费
孝
通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纪学人自述(第三卷)/高增德,丁东编.-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

ISBN 7-5302-0557-9

I. 世… II. ①高… ②丁… III. 学者-生平事迹-中国
IV. K8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4311 号

世纪学人自述(第三卷)

SHIJI XUEREN ZISHU

高增德 丁东 编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朝阳展望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25印张 324 000字

2000年1月第1版 200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7-5302-0557-9

I·449 定价:18.0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辑入了本世纪中国学术上垂范当代的两百名社会科学家的自述。所选学者生于1888—1936年间,以生辰为序,分为六卷。这些学者的治学领域,涉及文学、史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诸多方面。他们的著述接武先哲,启牖后学,取得了极高的成就。自述中学者们回溯自己与世纪同行的人生经历,历数甘苦备尝的治学道路。因系手口相传,故而弥足珍贵。对于关注本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灵演进史及学术发展史的读者,本书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卷收有周煦良、蔡尚思等三十八位学人的自述。

序 言

高增德 丁 东

20 世纪快要结束了。在告别 20 世纪之时，我们把这套六卷本的《世纪学人自述》奉献给读者。

本书是二百位社会人文学者分别撰写的自述，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幅 20 世纪中国学术史和知识分子命运史的全景图。有人把知识分子比喻为民族的大脑，那么社会人文学者，应该是民族大脑中最具有理性的部分。他们的心路历程，自然集中地浓缩着民族的精神历程。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学者群体的心路，就是民族的心路。

进入 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现代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和关于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研究，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成为显学。反思本世纪中国人走过的道路的书籍，也越来越受到读者的欢迎。这不是一个偶然出现的文化现象。就知识界而言，这实际上是一种深层的社会关注；就读者而言，这是一种理性的觉醒。在行将步入新的世纪的时候，中华民族具有反思历史的自觉，认真回顾一百年来的历程，总结经验教训，才能更好地前瞻 21 世纪的进程。

由中国古代的学术与西方的近代学术碰撞而产生的中国现代社会人文科学，诞生于上一个世纪之交，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发展至 30 年代，已经形成了比较全面的学科分类

和相当的研究规模，产生了诸多的学术流派和富有活力的学术传统，出现了一批堪称一流的研究成果。然而，到 50 年代，几乎所有的社会人文学科都失去了自身的特点，被改造成为意识形态的附庸，有的学科，如社会学、心理学，在“反右”以后干脆被取消。到了“文革”时期，文、史、哲、经，都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工具，成了革命大批判的喇叭筒，不管是有名无实的学科，还是无名无实的学科，到此已经停止了学术生命。直到 70 年代末，中国大地上开始了又一次思想解放，社会人文学科才得以起死回生。各学科的重新建设大约开始于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大体上已经全面铺开，过去有过的学科又都恢复了，国际上有而中国没有的学科也建立了，甚至一些中国独有的学科也产生出来。然而，比起学科的恢复，学者的人格和学术自信的恢复，大约还要晚十年。老一代学人经过“反右”、“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的摧残，生存都到了朝不保夕的地步，哪还有健康的心态从事学术研究和思想创造？到了 80 年代初，心态还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一下子找不回当年的学术自信 and 风采。中年一代的学者从教条主义的阴影下挣脱出来，想要冲破思想的牢笼，更有一个艰难的过程。直到 90 年代，“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才在学术界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得到越来越多学人的身体力行。内伤的深重，使中国社会人文学界经过二十年的努力，才重新与曾经有过的学术传统接轨，同时敞开怀抱，呼吸全人类思想文化的八面来风，使得社会人文学术重新走向兴盛。收入本书的二百位学者自述，基本上反映了中国现代社会人文科学曲折的发展轨迹和坎坷的奋斗历程。

本书的启动，可以追溯到 1978 年底。当时高增德筹备创办《晋阳学刊》杂志，设计了“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专

栏，向健在的老年学者约组自传，同时也请学生和亲属为先哲立传。当时的着眼点，首先是抢救史料。那些成名于 20 年代到 40 年代的学者，一部分没有熬过阶级斗争的疾风暴雨，已经过早地辞世，健在者也年逾古稀，乃至过了耄耋之年。请他们留下第一手的叙述，成了当务之急。有的学者年老体弱，已经不能执笔，只好口授整理。有的学者刚刚写完自述，就驾鹤西去。这二百位传主，一半以上已然作古。这些自述的成稿年代不一，其中有一部分完成于 80 年代初期，当时有的传主经过多年失语，尚未完全恢复学术自信。如果晚几年写，他们的思想可能更为解放。然而，自然规律又不容许我们等待。所以，他们留下的文字不免反映了当时中国学界大病初愈的特点。虽然今天的读者可能感到不尽如意，但这本身就具有一种独特的历史价值。一些学者心态逐渐开放，后来撰写的自述，就不只具有史料性，同时具有现实的思想性了。因为是自传和他传同时组稿，有些重要的学者，当时有他人为之作传，所以没有约写自传；因为本书纯属民间行为，有些重要的学者，没有联系上。这些缺欠，只好等本书有进一步扩大规模或增编续集的机会时来弥补。

本书的编排，以传主的年龄为序，而不按传主从事的专业分类，主要不是因为有些传主跨越几个专业，不好分类，更重要的是希望形成一种历史感。那些出生于上个世纪末，亲身感受过新文化运动的是第一代；出生于本世纪前一二十年，在三四十年代开始学术生涯的是第二代；出生于 20 年代末到 30 年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开始学术活动的是第三代。虽然每位学人的命运各不相同，但同代人的命运却有颇多相似之处。学术的命运，知识分子的命运，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和一定时期的政治、社会、文化大环境联系在一起的。个人聪明才

智的发挥，很难不受这种大环境的制约。几代知识分子的不同命运，留给我们太多的思考，太多的感喟。本书的传主，以第二代为多。而一些第一代的学者自述，当时没有抢救得到，不免留下永远的遗憾。

这些自述，对于现代学术史、教育史、思想史、社会史的研究，都有独特的价值。本书的大部分传主，在本学科有较强的代表性，所以，他们的自述，反映了那个学科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反映了一些学派的基本观点和学理，讲述了他们的师承、交流和治学经验，这是学术史方面的价值；这些学者还叙述了求学的经历，早期的讲到旧式的私塾和本世纪最早的新式学堂，一些人讲到留学的经历，许多学者还有执教的经历，这是教育史方面的价值；其中一些学者参加本世纪不同历史阶段的重大思想论争，有的还是论争中的关键人物，他们的回忆，为思想史留下了重要的证言，这是思想史方面的价值；在 20 世纪中国，学人曾经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而存在，也曾在全能政治的环境中，失去了独立的社会角色，这些自述，反映了学者阶层的命运变化，这是社会史方面的价值。

最近几年出版的学者传记、年谱或评传日渐其多，但我们还是感到自传自有不可取代的价值。自传、日记、书信都是第一手资料。虽然第一手资料的可靠性也需要辨析，但毕竟是其其他研究工作的原始依据。没有原始材料做基础，其他研究就成了空中楼阁。这就是我们格外看中自述价值的理由。书中多数自述附有著述目录，均按原貌刊印，未求格式统一。

这些文稿的出版经历了许多周折。80 年代初，就有一家出版社与高增德合作开展这项学术工程。先是面对僵化思想的禁锢，审稿每每遇到阻力，后来又面对市场压力，严肃纯正的学术书籍印数骤减，再加上当时经验不足，过于相信君子协

定，该出版社易人毁约，使这项学术工程半途而废。多亏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领导慧眼识珠，诸位编辑鼎力推动，使得这套《世纪学人自述》得以面世。在此我们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致以深深的谢意。另外，虽经努力，我们至今尚未与一些作者取得联系，恳请这些作者或家属尽快将通讯地址告诉出版社，以便奉寄稿酬。同时我们还要感谢费孝通先生题写书名，感谢那些提供自述的学者对我们的理解、信任与宽宥。对于一百多位故世的传主，我们只能追怀他们的成就与业绩，把他们的告白传诸后人，以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

目 录

- | | |
|--------|-------|
| 【 1 】 | 周煦良自述 |
| 【 13 】 | 蔡尚思自述 |
| 【 33 】 | 陆宗达自述 |
| 【 47 】 | 张孟伦自述 |
| 【 56 】 | 罗福颐自述 |
| 【 71 】 | 王季思自述 |
| 【 82 】 | 周有光自述 |
| 【 89 】 | 戴家祥自述 |
| 【100】 | 孙席珍自述 |
| 【114】 | 蔡 仪自述 |
| 【119】 | 傅振伦自述 |
| 【135】 | 华钟彦自述 |
| 【145】 | 谢兴尧自述 |
| 【158】 | 郝树侯自述 |
| 【168】 | 靳极苍自述 |
| 【183】 | 严北溟自述 |
| 【200】 | 单士元自述 |
| 【208】 | 吴斐丹自述 |
| 【223】 | 严 群自述 |
| 【228】 | 钱仲联自述 |
| 【234】 | 苏渊雷自述 |
| 【268】 | 朱智贤自述 |

【274】	戴裔煊自述
【288】	吴亮平自述
【301】	李鸿寿自述
【311】	江应梁自述
【319】	汤象龙自述
【325】	萧 璋自述
【333】	张岱年自述
【339】	杨伯峻自述
【347】	洪 谦自述
【350】	杨明照自述
【357】	吴丰培自述
【374】	陈瘦竹自述
【383】	任访秋自述
【394】	千家驹自述
【403】	杨向奎自述
【424】	傅统先自述
【436】	索 引



周煦良自述

我于1905年8月生于一个前清大官僚家庭。十五岁以前都是读的家塾，三岁起识字，识完商务印书馆的一千张背面有画图的白纸字块后，又认了各种颜色纸的字块二千字。毛笔字先由老师把着手教写，慢慢再自己写。读书先读三字经，然后是“四书”；但同时也读商务印书馆的国文教科书，其第一课是《天地日月山水土木》，仍是从识字开始，但是读到第四册，已经有了知了在夏天歌唱、冬天饥饿、向蚂蚁乞食的寓言。蚂蚁责备知了，问它夏天干什么来，最后一句话是“胡言饥？”多年后，找到林纾译的《伊索寓言》时，才发现我幼时读的那段寓言竟是林译的，不禁佩服“商务”选材之精。

我十二岁起读英文。一直到进大同中学之前，换了好几位老师，第一位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第二位是香港大学毕业的，第三位是胡敦复的堂弟胡宪生，第四位是胡敦复的嫡弟胡刚复，第五位是刚复先生留美的同学薛锦琴先生。薛先生的中文非常之好，我们在《小说月报》上发现她的两首金缕曲。她在我家教英语最久。我十五岁进大同中学后，薛先生还教我的弟妹。

大同中学最初叫大同学院，但当时只叫大同学院，一直到大学班开设时，才改称大同大学。我父亲周达和胡敦复、胡明复弟兄筹备成立中国科学社，大约也捐赠了一笔经

费，所以成立后和南通张謇一同被推为名誉会长(任鸿隽是会长)。由于有这些交情，我和我哥哥进大同学院都没有经过考试。记得入学时，老师问我数学读过什么，我说读过算术(是自修的)，就让我读几何和代数，英文则是读盖斯盖尔夫人的《克兰福德》，对我来说实在是深了一点。

大同是个重理轻文的学校，英语课教学目的主要是培养阅读能力，任课的教师是胡宪生，最着重分析句子成分，或者口问，或者叫我们上黑板上作图解。三年下来，我的阅读能力是掌握了，但是，口语比起我在中西女塾读书的几个妹妹来，都要差，而且由于学校重理轻文，我在中学毕业后就选了化学专业。五卅运动时，我起来反对学校那种要学生埋头读书的风气，反对学校当局的“学术救国”的口号，而代之以蔡元培提出的“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口号。我父亲得知我在学校闹事，很恼火，将我禁闭在家。我说我要读书，他问我要读什么，我不好要一个化学实验室，只好说我要学微积分，因为我吃够了不懂微积分而读力学之苦，他为我请了何鲁先生，当时最有名的数学家。何先生谈风极健，上完课后，燃上一枝烟，便畅谈天下事来。有一次他跟我说，做一个中国人而不读《资治通鉴》是不行的。我其实在家塾已经读过纲鉴，但听了他的话，便立刻把家里四部丛刊中的《资治通鉴》取出来读。我父亲看了，怕我损坏，只好另外替我买了一部毛边纸本的，并另外给我配了一只盒子。何先生给我打的微积分底子，使我四年后弃理修文，赴爱丁堡留学，攻读文科硕士的。能够跳过文科硕士要求的两年数学课，而径读理科的第三学年数学，并且成绩优等。但是，终由于性情不在数学，在这方面始终没有钻研下去。

我搞翻译最初是为了学习，那是在回国后的第三年，即

1934年，在前一年冬我参加福建人民政府，后来流亡香港数月返沪，无事可做，便想闭门读书。我读的硕士主要以哲学、心理学为主，为了想了解当代物理对哲学的冲击，我读了一些这方面的书，但觉得不够，为了进一步了解，便想把一本通俗的著作《神秘的宇宙》译出来。这书是英国天体物理学权威秦司写的。秦司是第一个提出太阳的自转只能产生双星系，而现在有行星环绕的太阳系则是由于有另一个恒星经过太阳附近，在太阳表面拉出巨大的浪潮，从而洒出几滴浪花，这些浪花从此便形成我们看见的行星系。秦司的理论是，由于两颗恒星相互接近的机会极少，在亿兆个太阳里，恐怕只有一个像太阳这样拥有行星系，因此我们人类在宇宙间是极端孤独的。

书译成后，我的老同学碰巧认识在开明书店任编辑的顾均正，他看了同意收在他们青年丛书里。到了下半年，我赴京住在四妹家时，书店来信索我写一篇序言，这可把我难住了，所幸我是个闲人，于是天天跑北京图书馆，连海森堡的书都借来看了。时间花了三个月，写了一篇八千字的序文，什么波力学量子论、测不准原理(当时我译非决定论)、熵(当时我译死热)，总算能讲一点了，这在我就算达到目的。

在北京呆的一年时间对我是个转折点。我本来想认真翻译一部英国哲学家的书，我选了贝克莱，因为洛克、休谟都有人译了，贝克莱的哲学太幼稚，无人顾及，我便想拿他开刀。在北京时我把自己译的《神秘的宇宙》寄了一本给我父亲，被他来信骂了一阵，说有些句子简直像外国话。后来我得知他在集邮杂志上写的白话文完全是“五四”以前的白话，但我当时还是接受了他的意见。在译贝克莱时，我定下一个假设，不管句子多长，中文一定能表达出来。这个决心下得很好，使我的表达能力加强了！但是我当时下的一个假设，即凡是外文能表达

得了的意思，中文一定也能表达得了。这个假设后来却不断受到挑战，因为这里牵涉到一个意译和直译的问题。

我的贝克莱进行得很慢，一晚只能译二三页，我也不急，反正有的是时间。但是交往的朋友多起来了，有旧识，有新朋友，而以搞文学的居多，我的兴趣也转移到文学方面。所以次年夏、秋回到南方，在暨南大学教书，也教起英国文学课来，哲学翻译基本上放弃了。

在暨南大学教书的两年(1935—1937)，我译了些现代英国文学论文和诗歌。译论文虽然是应《新诗》月刊的要求，主要还是为了学习，如艾略特的《诗的用处与批评的用处》叙论、叶芝的《牛津现代诗选序》、加劳德的《诗的研究》。我想弄清楚英文现代诗的情况，译诗则是为了试验建立中国新诗的格律。那时我也写新诗。写诗靠灵感，虽不是一挥而就，但至多也只能两三天，再多就写不成了。译诗则不然，尽可以五日一水、十日一石，尽情琢磨，非到满意不肯放手。虽说如此，我对自己译的几首华兹华斯仍不满意，觉得不能表现他那种平淡风格。后来译霍思曼的《希罗普郡少年》，这才找到合适的题材，还因为那时已是1937年初，我对怎样建立中国新诗格律已形成自己的见解，翻译不是为了学习，而是为了进行试验了。《希罗普郡少年》一共是六十三首。开头在《新诗》上发表了七首，后来又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十三首。我想一鼓作气在年终译完它，但是抗日战争爆发，这个计划当然也告吹。

那年秋天，我本来已经应聘燕京大学，现在北上既不可能，就西上到汉口，到成都，到峨眉山，再折返成都，而重庆，而香港，而上海。后来又由上海迁居扬州。及到1945年抗日胜利时，我已经由一个独身青年成为一个有家室的中年人了。但是，抗日战争八年中，那本《希罗普郡少年》都一直放

在身边，并且断断续续地在译着，一直到 1948 年底在武汉大学任教时方才完成全集的翻译和注释。

任何搞翻译的人都有其学徒阶段，翻译《希罗普郡少年》为我完成了我的学徒阶段，使我学会了为适应格律而改变句子的结构和另外造句，懂得以文言入诗、以外语结构入诗的不可避免性，懂得了汉语同义词的丰富和自己词汇的贫乏，懂得了自己虽然是中国人，但是掌握本国语言的能力远不够翻译的要求，从而对汉语语法也留意起来。现在回想起来，如果 1937 到 1945 这八年中我译的不是霍思曼的诗而是贝克莱的哲学，或者一部小说，收获绝没有这样大。

我没有计算一首诗的翻译需要多久，只记得有一首十二行的诗译了一个星期，另一首三十二行的诗译了一个月；这些诗到译成之后，原诗和译诗都能背诵如流了。记得在成都时，文协在罗念生先生家开晚会，有人朗诵新诗，我即席朗诵一首《希罗普郡少年》中的《某木匠子》，是四行七节，先诵原诗，后诵译诗，那天因受寒喉咙作哑，但效果自认为很好。1945 年冬上海文协成立，郑振铎主持，朱维基朗诵诗时忽然眼睛花了，朗诵不下去，退下。振铎先生要我朗诵一首，我便朗诵上面提到的那首三十二行的诗。我不大懂得，为什么自己译的诗还要捧着本子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有人连自己写的诗朗诵时，也要照着本子读。岂非怪事！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一面同傅雷主编《新语》半月刊，一面任光华大学外文系主任。《新语》办了五期就停刊，光华大学外文系主任则因我在 1947 年春天公开支持校内学生的反内战、反饥饿运动，在暑假被学校解聘，赴武汉大学任教，直到 1949 年 2 月因父亲逝世方才奔丧返沪。但是在 1945 至 1947 这两年中，我却翻译了两部小说，这是我过去从来没有

做过的。

我对英国文学的兴趣主要在诗歌方面。小说只拣自己喜欢的看，不管名头大小，通俗的也看；侦探小说、探险小说、神秘小说，这些我从小被翻译小说所引起的兴趣，长大后并未稍减。这次译的两部小说，一部叫《地球末日记》，叙述天外来了两颗星，进入太阳系，甲星将要撞掉地球，乙星则是和地球一样的人类可以居住的行星。地球上的科学家得知后，决定成立末日委员会，预备造一个容纳一百人的宇宙飞船，把最优秀的人类和人类成就载往乙星，延续人种。书是30年代作品，反映美国当时的社会情况，也伸张了人类的理想。另一部是《珍妮的肖像》，美国罗勃特耐珊的一个中篇幻想爱情小说。前者以情节引人入胜，后者则是以优美的抒情文笔吸引了我。两书的翻译纯粹是从爱好出发的。《地球末日记》由龙门书局出版；《珍妮的肖像》则一直放在抽屉里睡觉，直到1980年才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距译成的时间已经三十多年。这两部书我至今仍很喜欢。在《地球末日记》中，有几章如甲星第一次经过地球附近、在地球表面造成巨大破坏，如人类永远离开地球、出发和途中亲眼看见地球毁灭和抵达新行星的那几章，自己译得相当得意，后来高兴时还拿出来重读一遍。《珍妮的肖像》则被用来作为我教翻译课时英汉对照的教材。

《地球末日记》出版后，我送了一本给我父亲，他没有再骂。但拿我自己来说，这部小说却使我受到一次教训，因为后来我发现书中提到的两个星座早已有了译名，而我只是音译，还有“法国式窗户”是“落地窗”之误。从这些错误，我认识到：（一）工具书应当多备，而我连一部综合大辞典都没有，当然不知道这些星座的译名。（二）误译总是由于自己不懂而自以为懂时才产生，如果虚心一点，或者心细一点，至多译不出而